

国际观察

在国内新闻报道与众多学者的分析中，日本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宽松教育”改革，不仅没能给学生带来真正的宽松，反而酿成“公立瘦弱、私营肥满”、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剧、国民学力水平普遍下滑等不良后果，最终日本政府于2016年宣告与“宽松教育”诀别。然而，“宽松教育”真的乏善可陈吗？

实际上，日本“宽松教育”的初衷和理念都是值得肯定的，它所引发的包括学力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后果实则应该归因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而非“宽松教育”本身。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宽松教育”改革的背景、内容及其走向终点的过程、原因等，分析“宽松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以期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即教育改革本身是一个由教育内外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的、需要不断校正方向和目标的系统性过程。

“宽松教育”的来历

日本教育受经济发展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培养大量工业领域人才的需求映射到教育领域，教育教学偏向于在短时间内对知识进行量的堆积，再结合日本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模式，导致20世纪70—80年代，考试竞争、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等教育问题达到顶峰。加之日本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起倡导新自由主义，日本开始提倡打造宽松型学校，减轻学习负担，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这样的教育动向以及这一动向下的教育改革被称之为“宽松教育”。

“宽松教育”译自日语“ゆとり教育”。根据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ゆとり”是指事或物在程度上有宽裕、有富余，也可形容精神状态。必须注意的是，“宽松教育”这一词汇并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官方术语，而是媒体大众依势造出来的名称。日本文部省（2001年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前调查官寺胁研曾表示，“宽松”一词用作教育词汇，从语感上来说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甚至会引发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误解，因为“宽松教育”从字面上看，很容易给大众带来一种“放松教育”的错觉。因“宽松教育”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约定俗成的译法，本文仍使用“宽松教育”这一译法，但为了忠实于原本的意思而将“ゆとり”译为“宽裕”。

日本基于“宽裕”理念的课程改革，是以启发式教学代替“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意欲改变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引入灵活化、弹性的教学机制，这是对以灌输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形式发起的挑战，也是建构开放型现代化课程体系的一次尝试。因此，日本“宽松教育”的出发点和理念都是值得肯定的。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日本小学课堂

日本『宽松教育』再思考

李冬梅

日本“宽松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7年修订版《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创设宽裕且充实的学校生活”这一改革口号，在1989年和1998年修订版《学习指导要领》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削减中小学学习内容、缩短小学生课时数、增设“综合学习时间”。“宽松教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缓和了教育的紧张氛围，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消极结果，受到了诸如引发学力下降、拉大阶层差距等相关批判。尤其是日本学生在2013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3）和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6）两次测试中排名的大幅下降，更是将“宽松教育”推向

日本政府与“宽松教育”的诀别，似乎意味着“宽松教育”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然而，“宽松教育”作为一场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和路径的选择，更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选择，所以“宽松教育”引发的包括学力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很多后果实则应归因于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大背景。

在日本，对“宽松教育”最大的批判落脚在削减课时和学习内容导致学生学力下降这一点上。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电视机和游戏机普及的时代，这一时期恰逢《学习指导要领》对学生在校时间进行削减。在校时间减少带来课后时间

首先，“宽松教育”改革在不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就削减课时和学习内容的措施并不科学。日本学生的学习负担虽然表现为在校学习时间长、课后作业多等，但为学生营造“宽裕”的教育氛围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削减学习时间和内容就能达到的，改革应该在保障一定的课时数与学习内容的基础之上，重点通过优化学习方式来提高学习效率，确保学力的稳步提升。

其次，所谓兼顾平衡就是在有所削减的同时也要有所增加，但增设的“综合学习时间”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补充和转轨”职能。“宽松教育”改革中虽然提倡“综合学习时间”，通过体验式、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但到底如何实施，当时的文部省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意见或学习的案例，也没有给中小学及教师提供相应的指导和支持，因此徒增了学校和教师的工作量和无力感。

最后，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平衡及其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也是“宽松教育”改革走向终点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宽松教育”并未保证教育系统内部的平衡。在社会竞争形势不变的前提下，日本政府没能同步推动评价方式的变革，对于“宽松教育”改革中提出的培养学生“生存能

舆论风口。

在各方压力之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逐渐调整教育方向，从关注“宽裕”转向关注“扎实的学力”，开始强调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重要性。2008年，文部科学省在《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中增加了小学和初中的课时数与学习内容，表明要切实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这一转向被日本媒体及学界称为“去宽松教育”。2016年5月，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正式发表了与“宽松教育”的诀别宣言，称日本教育不会再回到“宽松教育”或“填鸭式教育”的非此即彼中，而是平衡好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之间的关系，至此，“宽松教育”改革走向终点。

增加，手机、电视、游戏等大众文化媒介在大量的课后时间中极大地分散了学生注意力。与此同时，拥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课后被送返于各类补习班之间，这也导致了“宽松教育”背景下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学力差距拉大。除此之外，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3年开始逐年下降，并于1997年进入少子化社会，加上这一时期大学数量的增加使得大学升学竞争逐渐缓和，而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在逐渐崩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认为没有必要寒窗苦读，这进一步导致了学生学习动机的减弱。因此，在分析“宽松教育”的时候，要看到上述社会背景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联。

力”的目标，当时的文部省没有给出能够对“生存能力”进行考察和评价的指标、框架及内容。另一方面，“宽松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系统之间产生了脱节，当时的日本社会用人制度依旧高度关注学生的学历，也因此，“宽松教育”提倡学校重视“生存能力”培养、要求学校创造“宽裕”氛围的理念最终流于口号。

日本《朝日新闻》于2016年5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宽松教育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只有删减教学内容，其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初衷却并没有传递给社会大众。重要的不是否定宽松教育，而是要看到宽松教育的问题以及哪些东西值得被传承下去。”实际上，从2017年修订的最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及近年来日本的教育改革文件来看，“宽松教育”理念并未从日本课程中退出，课时和内容虽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回到1998版《学习指导要领》之前的水平。“宽松教育”的理念实际上通过“生存能力”以及课程教学方法上的“能动性学习”（active learning）口号在延续。所以，“宽松教育”虽然走向了终点但并没有终结。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环球视线

二元制职业教育遭遇挑战

德国职教培训保障路在何方

陈正

近年来，德国青年对二元制职业教育的兴趣逐渐降低，许多企业面临着申请者寥寥的境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加剧了这一趋势。根据德国最新职业教育报告数据，2021—2022年度新签订的职业培训合同数量为47.3万份，比前一年度略高，但明显低于疫情暴发前2019年度签订的52.5万份。伴随着疫情的反复，德国青年对二元制职业教育的兴趣降低的趋势明显加快。例如，2019年5月仍有近44万人在联邦劳工局申请职业教育培训名额，而2022年5月这一数字仅为35.8万，较前一年减少2.4%，三年总体下降超过18%，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遭遇严峻挑战。

岗位申请率降低，就业前培训举措式微

德国职业教育培训岗位名额数量虽然在疫情期间急剧减少，但目前已基本恢复，接近疫情前水平。然而，尽管许多企业有意提供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岗位，但培训名额空缺不满现象并不鲜见。

在德国，如果青年没有直接接受职业教育，那么就业前的培训就成为其通向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桥梁，这些培训举措得到联邦劳工局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疫情期间，联邦劳工局提供就业前培训和职业教育资助的申请率却比以往低得多。德国青年不仅不接受二元制职业教育，也几乎不利用联邦劳工局提供的职教院校申请服务。这就意味着，接受二元制职业教育的人数在减少，同时参与就业前培训的人数也没有增加。因此，可以假设，德国不少学生要么在学校系统中停留更长时间进行深造或者获得学历，要么对学校自身提供的职业教育更感兴趣。此外，一些学生也以实科中学或文理中学为目标，因此疫情期间此类学生在联邦劳工局注册的申请人中的比例同样有所下降。德国联邦劳工局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最近对德国文理中学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许多学生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休息一年，审慎考虑自己未来方向，再决定究竟是接受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

提高职业吸引力，增加进入理想企业培训机会

德国的职业教育保障虽然可以帮助更多德国青年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但无法满足所有人在理想企业中接受培训的需求。德国政府或许可以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以合法的职业培训措施，间接地增加青年进入理想企业内培训的可能性。德国政府可以推动处于过渡性体系阶段的青年向企业内培训过渡。德国选择进入过渡性体系的青年人数规模较大，2019年进入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数约为49.2万，而选择进入过渡性体系的人数为25.5万，占前者人数的一半多，这表明德国职业教育的潜力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同样，职业学校也必须与组织地合作，使得学生成功从企业外培训过渡到企业内培训。所有措施都应更加注重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行业。职业教育保障还必须为低门槛职业业的从业者提供培训，这些工作对教育背景较弱的青年来说更容易上手。

当然，职业教育保障无法解决二元制职业教育的所有问题，也无法切实扭转实科中学或文理中学毕业的青年对二元制教育不再感兴趣的趋势。在这些青年看来，企业内培训的职场缺乏吸引力，工作内容被切割得太过细，提供的发展前景也有限。这种职业形象和职业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在疫情期间更加突出。例如，在酒店、餐饮等行业，工资相对较低，工作时间和条件也不如其他职业有吸引力。同样，在手工业等行业的培训中，许多青年也意识到没有改善经济状况的企业。因此，与学术型教育相比，企业培训必须提高其吸引力，这正是当下青年的所思所愿。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领导与管理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环球快报

澳大利亚将推出《国家教师队伍行动计划》

近日，澳大利亚发布《国家教师队伍行动计划草案》并公开征集意见，意在吸引和留住更多教师，以解决教师短缺问题。

该计划草案概述了六个领域的专项行动，强调政府、非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要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一是提升教师专业地位，认可教师价值，包括开展全国性尊师重教活动、设立新的澳大利亚年度教师奖等。二是改善教师供给，如在大学增加合适学科和专业的教学名额，增加“高成就教师计划”名额，鼓励更多专业人士转行从事教学工作，优先办理合格教师的签证等。三是加强职前教师教育，包括审查职前教师教育质量、采取行动吸引和留住原住民

教师、确保师范生获得有针对性的支持等。四是使教学时间最大化，包括设立“减少工作量基金”，试行新方法减轻教师工作量，让教师专注于教学、规划和合作；有效调配和发挥职前教师教育学生、助教和其他非教学人员的作用等。五是更好地了解未来教师队伍的需求，如建立和发布全国统一的教师队伍供需预测数据库、建立国家质量框架、指导教师认证工作等。六是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途径，包括简化“高成就和领导力教师”认证程序、加强初任教师和学校领导的指导和入职培训等。

关于该计划的反馈意见，将为澳大利亚教育部在12月进一步完善计划和行动提供参考。

（李佳洋）

爱尔兰发布《学校质量框架》报告

日前，爱尔兰教育部发布了《展望我们的学校2022：小学和特殊学校质量框架》报告，其姊妹篇《展望我们的学校2022：中学质量框架》报告同时发布。爱尔兰学校质量框架从学习和教学与领导和管理两个维度出发，制定相应标准，为学校教师 and 领导者提供参考。

报告将学习和教学维度分为四个领域，即学习者成果、学习者体验、教师的个人实践以及教师合作实践。领导和管理维度则包括领导学习和教学、管理组织、引领学校发展和培养领导能力四个领域。报告在标准部分描述了不同领域相关的行为和属性。每个标准都提供了实践说明，分为“有效”和“高效”两个层次，更详细地描述每个标准所指代的内容。

质量框架的制定遵循十项关键原则：保证学习与学习者的整体性、提高学生参与度、以学生幸福感为中心、重视优质教学的重要性、促进学校成为学习型组织、学校对其提供的教育质量负责、学生是学习中的主动参与者、促进内外部评估对学校改进的贡献、领导和管理的重要性并举、发挥所有人的领导角色。

报告指出，质量框架是一个可选择使用的综合框架，旨在为教师、学校领导和相关人士提供尽可能广的参考范围，而非僵化的条例。它将会在供教师与领导者反思实践和学习效果、为学校招聘提供统一标准、推动透明的问责和改进机制、提供系统性的专业学习机会、培养和发展教师及学校领导等方面发挥作用。

（王颖）